

彻底批判
反动影片《反击》

07.35

甘肃人民出版社

彻底批判反动影片《反击》

*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庆阳路230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1977年8月第1版 197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0

书号：10096·130 定价：0.08元

7207.35
10
2

映前批判词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精心策划，授意炮制的反动影片《反击》，就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一株大毒草。

在《反击》的炮制过程中，“四人帮”及其亲信，怀着险恶的用心叫嚷：“抓《反击》是大局”，“要纳入大的政治斗争”，“可以写到中央”，搞成“整个社会的缩影”，他们用贼喊捉贼的卑鄙手法，蓄意颠倒敌我关系，在影片中捏造了一个省委第一书记的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四人帮”倾注了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刻骨仇恨，加上了只有他们自己才干得出来的种种罪恶，妄图制造混乱，以打倒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反击》精心塑造的所谓主要英雄人物，是一个猖狂地进行反党活动的形象。另一个所谓英雄人物，是“四人帮”一伙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的化身。影片拍成之后，“四人帮”曾得意忘形地宣称，这部反动影片是“重型炮弹”、“强级地震”，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在全国上映，以配合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迎接他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复辟的所谓‘盛大节日’的到来。”



A 42200~

1

以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这部反动影片也很快被广大革命群众揭露出来，成为“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的记录。

有组织的在内部放映反动影片《反击》，并进行公开批判，是为了揭穿“四人帮”一伙极右派的反革命真面目，使毒草变成肥料，让广大干部和群众加深认识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伟大意义，把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反革命狂想曲的幻灭

杨志杰 朱 兵

编者按：这是一篇好文章。它从剖析反动影片《反击》中的所谓“走资派”的形象入手，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四人帮”炮制反动影片《反击》，是他们篡党夺权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搞出这部影片，他们倾巢出动，一齐上阵，定主题，选外景，临现场，发指示，紧锣密鼓，喧喧嚣嚣，忙得不亦乐乎。影片刚开拍，就一催再催，急如星火；摄制未完，就布置吹嘘鼓噪；连某月某日登广告都已定好。可是，到预定出笼的前夕，张春桥又突然下令暂不公演。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安插在文化部的一个亲信露了底：“要等时机”，“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好家伙，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他们实现反革命复辟的“时机”就要到来了，他们就要举起资产阶级的钢刀杀人了。这哪里是拍摄电影？这哪里是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分明是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猖狂进攻，分明是“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预演。

但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这部反革命狂想曲还没有来得及演到最后一幕，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罪恶阴谋。这部影片不仅成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证，也成了一个绝妙的反面教材。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时就指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今天，把反动影片《反击》拿出来示众，以供广大群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它和它的炮制者进行彻底批判、彻底清算。毒草是可以肥田的。让我们一起来锄掉《反击》这株毒草，以肥社会主义之田吧！

电影《反击》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精心炮制的一株大毒草，是他们妄图篡党夺权、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一次预演。影片中的主要反面人物是省委第一书记韩凌。他头上有三顶大帽子：“走资派”，“还乡团”，“刽子手”。“四人帮”杜撰韩凌这个典型，是为了丑化革命的老干部，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倒打一耙，走资派陷害革命派

“走资派”。不错，现实生活中的确有这样的人：他们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推行篡党夺权、复辟倒退的极右路线。那么，为什么说《反击》中“走资派”形象的塑造过程，却是个阴谋呢？这是因为“四人帮”及其亲信所说的“走资派”，是按照他们所谓老、大、多的理论炮制的。所谓“老”，就是资格老。在“四人帮”看来，凡老皆“修”，越老越“修”，他们把老革命都说成“民主派”，又把“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说成“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在影片中，韩凌是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按照“四人帮”的“既定方针”当然要戴上走资派的帽子了。所谓“大”，就是权力大。韩凌职务的设计，就是按照这样的条件不断升级的。先打算写校党委书记，后改为教育厅长、省委文教书记，最后确定就写个“不肯改悔的省委第一书记”，而且要从他嘴里“说到中央”。“四人帮”的亲信扬言，他们的写“走资派”，“就是要抓”韩凌这样的坐着“红旗车”的“大家伙”。所谓

“多”，就是数量多。按照“四人帮”的理论，走资派简直无处不在，遍地乱走，除了省委第一书记韩凌是走资派外，省报主编、黄河大学革委会主任等等统统被写成走资派，一个个都是“顽固不化”，“不肯改悔”。总之，“四人帮”所说的“走资派”，“大”至中央，“多”到全国，“老”到最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没有他们自己。

“老、大、多”，关键在于“大”。“四人帮”的所谓“写走资派”，矛头是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击》中就是这样：他们把韩凌写成一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是处心积虑地在这个人物身上影射攻击周总理。他们故意用周总理生前某一位秘书的名字作为韩凌秘书的名字。经人指出之后，仍然采用谐音的办法，继续影射。他们还故意把影片中那个反革命组织的名字叫做“拯救四化委员会”，公然影射和攻击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在四届人大宣布的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其用心何其毒也！不仅如此，《反击》剧本一脱稿，“四人帮”的亲信就立即指令接着写《反击》续集，并再三强调主题要反映“按既定方针办和不按既定方针办的斗争”，猖狂反对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按照“四人帮”的计划，他们的“反击”还要续下去。续下去还要反对谁？不用问，有他们的“既定方针”摆在那里，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有一个，他们就反一个，有多少，他们就反多少，他们的“反击”，就是要反对一切，打倒一切，最后剩下他们自己那一帮。

“四人帮”的理论家们，不是常常摇头晃脑地讲自己最懂“辩证法”吗？岂不知，唯物辩证法是无情的，它常常无情地嘲弄那些倒行逆施的小丑。既然“四人帮”精心设置的“走

“走资派”是这样多，要打倒一大片，那么，他们自己岂不就是“一小撮”了吗？事实正是如此！“四人帮”总是自觉地站到八亿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面前，他们永远显得十分孤立、十分虚弱、十分渺小！而越是这样，他们便越是“自我扩张”，为自己树碑立传。在《反击》中，“四人帮”一面把革命的老干部污蔑为走资派，一面又拚命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老干部”。“四人帮”心目中的英雄，影片中的所谓“老干部”赵昕，就是他们竭力吹捧的一个“老前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什么这样吹捧？因为她是江青的化身。这个戴着“江式眼镜”的赵昕，竟然操着江青的腔调，恬不知耻地自我吹嘘说：“她‘雪山、草地都跟着毛主席过来了！”好一个“爬雪山过草地”的“老革命”！谁不知道，当我们的革命老前辈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四人帮”中的所谓“老革命”，正在为敌人缴械，向敌人投降呢？当年争演《赛金花》、向独夫民贼蒋介石献机祝寿的，不就是这个江青吗？！他们爬过什么“雪山”？他们爬的是敌人的“狗洞”！他们走过什么“草地”？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成天花天酒地！而这帮连歌颂伟大长征的《万水千山》都不肯看一看的家伙，竟然要在银幕上为自己捏造亲身经历“雪山、草地”的“光荣历史”了！这真比当年刚刚混进革命队伍的林彪硬要把自己打扮成“南昌起义”的代表还要无耻！

究竟谁是走资派？“四人帮”在《反击》中把韩凌描写得昏庸无知、腐败不堪，企图用歪曲丑化的手法，把他写成革命老干部的典型。我们说：“四人帮”的先生们，你们写的这个“走资派”，象则象矣，但并非“维妙维肖”！如果

层人”。在“四人帮”及其亲信的授意下，影片里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受批判的干部都被写成耿耿于怀、怨气冲天，而韩凌一上任，又无不加官晋爵，沉渣浮起，成为韩凌反攻倒算的帮凶。用“四人帮”亲信的话来说：就是什么“还乡团除了团长，还有副团长，中队长，小队长”呀，什么“走资派还在走，不是一个人在走，是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呀，什么和韩凌“有一样思想的有一层人，要解决这一层人的问题”呀，等等，等等。请看，“四人帮”眼里的“还乡团”哪里是“一小撮”，分明是一个团、几个团，甚至几十个团，简直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复辟大军”！

根据这三条原则，“四人帮”便提出了一个激烈得很的口号，叫做：“揪一层”和“层层揪”。

这是一个直接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反革命口号！

这个口号全面否定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面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我们绝大部分革命老干部在这场大革命中经受了风雨，得到了锻炼，焕发了革命的青春，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他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肩负起革命的重担。这本来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但是，“四人帮”却把这些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老干部看成老冤家、死对头，视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恨不得把他们通通揪出，一概打倒，都扫进十八层地狱。这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否定又是什么？不仅如此，在《反击》中，“四

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地主阶级反动队，谁不切齿痛恨呢？“四人帮”把韩凌写成“还乡团”，是为了煽起人们对他的憎恨，以便捉而打之。但是，只要我们翻开这顶大得吓人的帽子一看，便会哑然失笑：原来里边装的是另外一种货色！

什么是“四人帮”所说的“还乡团”呢？还是让我们看看对韩凌的出场安排吧！韩凌第一次和观众见面，就是坐着“红旗车”回来官复原职的。只见他满脸横肉，放声大笑，口出狂言，心怀叵测，正在得意之际，忽然江涛的“开门办学大军”迎面截断了他的去路，于是韩凌只得气急败坏地喝令司机：“开倒车”。这一下，明白了，他们所谓的“还乡团”就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重新工作，即他们所谓“官复原职”的人。“复职”就是“复辟”，这就是“四人帮”写“还乡团”的第一条原则。

他们写“还乡团”的第二条原则是：老干部重新工作后，必然走资本主义道翻，而且不肯改悔。在炮制《反击》的过程中，曾有人提出最后是否可以“体现一下党的政策”，让韩凌有所转变。这种看法立即遭到“四人帮”亲信的痛斥，说什么，这是“对重大理论理解不够”还公开叫嚣：“对政策的考虑是多余的”。什么“重大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哪一项重大理论，没有被他们歪曲，被他们修正？他们的所谓“重大理论”，不过是臭名昭着的“张春桥思想”，不过是“四人帮”篡党窃国的一整套“既定方针”。什么“多余的”，他们公然把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说成是多余的，他们反毛主席的丑恶目的暴露得多么清楚，他们是专门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的！

他们写“还乡团”的第三条原则是：“复辟派”有“一

层人”。在“四人帮”及其亲信的授意下，影片里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受批判的干部都被写成耿耿于怀、怨气冲天，而韩凌一上任，又无不加官晋爵，沉渣浮起，成为韩凌反攻倒算的帮凶。用“四人帮”亲信的话来说：就是什么“还乡团除了团长，还有副团长，中队长，小队长”呀，什么“走资派还在走，不是一个人在走，是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呀，什么和韩凌“有一样思想的有一层人，要解决这一层人的问题”呀，等等，等等。请看，“四人帮”眼里的“还乡团”哪里是“一小撮”，分明是一个团、几个团，甚至几十个团，简直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复辟大军”！

根据这三条原则，“四人帮”便提出了一个激烈得很的口号，叫做：“揪一层”和“层层揪”。

这是一个直接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反革命口号！

这个口号全面否定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面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我们绝大部分革命老干部在这场大革命中经受了风雨，得到了锻炼；焕发了革命的青春，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他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肩负起革命的重担。这本来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但是，“四人帮”却把这些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老干部看成老冤家、死对头，视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恨不得把他们通通揪出，一概打倒，都扫进十八层地狱。这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否定又是什么？不仅如此，在《反击》中，“四

人帮”把韩凌的“复职”当作“复辟”路线的具体体现，并极力渲染韩凌怎样狂热地大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威风，其目的是为了引出一个更具有煽动性的问题：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岂是自己或别的什么人能够随便使其“官复原职”的吗？而且，他们写韩凌只不过是一个代表，象韩凌这样“一层人”“复职”即“复辟”的“根子”在哪里？“四人帮”的矛头所向，是十分清楚的。“四人帮”通过韩凌形象的塑造，企图向人们展示这样的逻辑：老革命都是“走资派”，“走资派”都是“还乡团”，“还乡团”都该被打倒，而他们所以没有被打倒，还复了职，因为他们的根子在中央。请看，“揪一层”，“层层揪”这个口号的反动性不是十分清楚了吗！

“揪一层”，哪一层？“层层揪”，怎样揪？“四人帮”用自己的丑恶表演，作了具体的回答。在《反击》中，他们表现出：“揪一层”，就是要追上揪与韩凌不相上下的独当一面、主持工作的负责人，进一步查“根子”、追“后台”，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把这“一层人”揪出来，地方就乱了，中央就空了，他们就好乱中夺权了。所以，他们塑造韩凌，就是为了“电影一出来，就在各地掀起一个揪省委第一书记的运动”，从而把全党全国都搞乱！其实，他们哪里等得及影片出来，还在拍摄过程中，这个“运动”就已经开始：在“四人帮”及其亲信的操纵下，《反击》摄制组到那里去拍外景，那里就掀起揪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逆流。从而，在摄制组里，发生了递送黑信、搜集黑材料等怪现象，在电影的拍摄地就出现了大量的打倒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大标语。更有甚者，有的人不断用电话同北京联系，声称只要

“影片一通过，立即就去揪斗省委主要负责人”。还有一次，“四人帮”的亲信看到一批省委书记和各部部长到一个学校去参观，就咬牙切齿地说：“来了一群还乡团”。既然是“还乡团”，按照“四人帮”的“既定方针”，当然都在该“揪”之列！可见，这些主持中央和地方工作的“一层”党政军负责同志，都是“四人帮”要揪的对象。

“揪”韩凌这样“一层人”还只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步骤，接着便是“层层揪”。层层揪就是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大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小到工厂车间、人民公社生产队，来一个全面大夺权，借用《反击》中的一句话，叫做：“不听话，新的老的一块撸！”“四人帮”不是强调要写“省、市、地、县”都有“走资派”吗？不是要通过韩凌这一层人“说到中央”，来表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吗？必须指出：影片中“说到”的“中央”，实际上是指当时已经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同志。张春桥不是一面抛出“写走资派”的黑纲领，一面在那里恶狠狠地诅咒什么“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吗？

“四人帮”的亲信不是一边炮制《反击》，一边咬牙切齿地狂吠：“中央出了大走资派”，“不是邓小平，而是邓大平”吗？这就是要为他们反对华国锋同志，全面夺党中央的大权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我们看，在“四人帮”的明文规定下，为了配合他们“层层揪”，不管是诗歌还是散文，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不是都非得写走资派不可吗？没有写的，就硬加一个，原来改悔的，不准改悔！一时间，在舞台上，在银幕里，“走资派”的帽子满天飞，“还乡团”的队伍到处跑。“四人帮”过去

高唱要以“高大完美”的英雄典型“占领舞台中心”，如今却让无数个“走资派”占领舞台，这岂不是绝妙的讽刺吗？然而，这正是“四人帮”所要制造的那种场景：我们的国家真的已象《反击》中所描写的那样，“走资派”正占领着政治中心，到处是“乌云翻滚，浊浪排空”，非由“四人帮”这些“救世主”来力挽狂澜，收拾残局不可了。

请问：到底谁是“还乡团”；究竟谁该“揪出来”？比起历史上那些复辟派来，“四人帮”表演得也够充分了：他们把专横跋扈、篡位夺权的吕后抬出来“学习”，他们对投降卖国的慈禧太后自愧不如，其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伪造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所谓“按既定方针办”；他们做好了标准头像，选好了黄道吉日，准备一旦大功告成，便要面南登基，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去。这些封建帝王的好子孙，复辟牌“帽子公司”的总经理，难道不正是当代最大的“还乡团”吗！

一枕黄粱，癞皮狗变成落水狗

《反击》中韩凌这个形象，最终在于说明：韩凌这样“一层人”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于是，韩凌的帽子除了“走资派”“还乡团”之外，还有第三顶：“刽子手”。“四人帮”的篡党夺权三部曲也就到了最后阶段：取而代之。

影片中写到，韩凌为了强行贯彻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竟然到处制造白色恐怖，随意撤换党的干部，甚至把“正确路线的代表”江涛投进监狱。《反击》通过一系列阴

森恐怖、凄凄惨惨的描写，“控诉”了韩凌“迫害江涛”的“罪行”。矛盾发展到高潮，江涛含义深长地大声疾呼：“他们现在还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很大一部分权力！”

好一个“很大一部分权力！”江涛这一声呼喊，的确是《反击》的“点睛之笔”，它暴露了矛盾的性质，表现了冲突的焦点，也最后供出了“四人帮”把韩凌写成“刽子手”的恶毒用心。

韩凌和江涛的矛盾，显然已上升为夺权与反夺权的你死我活的斗争，韩凌成了一个比地主、资本家，甚至比国民党反动派还厉害的反革命。江涛是这样“控诉”他的：“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谁能把共产党员投进监牢呢？国民党办不到，地主、资本家办不到，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办到了”。韩凌既然如此罪大恶极，当然应该坚决打倒。但是，请注意，《反击》中的韩凌，可是“四人帮”精心杜撰的“老、大、多”的“走资派”的典型。他们意在表明：“修正主义上台”，不仅仅是韩凌一个。韩凌烂掉了，省委烂掉了，省报烂掉了，党的各级领导都烂掉了。岂止如此，韩凌所代表的那“一层人”也就都烂掉了，也就是各省的省委、省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也都和韩凌所在的省一样，烂掉了！而且，他们是有根子的，根子在“中央”。这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已经被修正主义所篡夺，“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层人”都在干着“国民党办不到，地主、资本家办不到”的坏事。如果把所谓“一层人”换成一小撮，把党的各级领导换成“四人帮”，这样的描绘倒是十分恰当的，但是在这里，“四人帮”所攻击的，却是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所“控诉”的，却是我

们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黑白不容颠倒，是非岂能混淆。谁是货真价实的刽子手？那个诡计多端的张春桥亲笔写下的篡党复辟的提纲中，不就有“怎样巩固政权，杀人”这样几个血腥的字眼赫然在目吗！在《反击》炮制的过程中，“四人帮”的亲信一面千方百计把韩凌打扮成老干部的代表，一面咬牙切齿地说：“应该抓起来枪毙几个，可惜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法律。我想将来政策上总会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还十分惋惜地说：“我们动手慢了点儿，不然‘五一’可以枪毙一批！”请看，他们不正是磨刀霍霍的刽子手吗？这帮害人虫难道欠下人民的血债还少吗？他们疯狂反对毛主席；他们残酷迫害周总理；他们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无情镇压，投进监狱。这笔笔血债，一定要彻底清算，决不能心慈手软。

“四人帮”写“走资派”是为了“揪走资派”，“揪走资派”是为了“取而代之”，简言之，就是为了夺权！怎样才能“取而代之”呢？“四人帮”通过江涛对韩凌的夺权，描绘了一幅他们梦寐以求的反革命政变的蓝图。这个江涛，以貌似革命、实质极右的口号，把自己打扮成“教育革命的旗手”，然后以黄河大学为基地、教育战线为前沿，全面推行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紧接着，便四面伸手，八方策划，把自己凌驾于校党委乃至省委之上，把自己控制的刊物凌驾于党报之上，当做经典，指导运动，甚至动用民兵，企图作为“借用力量”，策划反革命政变。无论“四人帮”如何百般掩饰，难道这不正是他们自己篡党夺权活动最真实不过的写照吗？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自然不仅仅是要推翻

一个省委书记韩凌，他们要颠覆的，是我们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在清华大学的一个走卒曾经一语泄露了“四人帮”的天机，他愤愤不平地说：“四届人大，部长的职务差不多叫他们抢光了！”一个“抢”字，境界全出。原来他们梦寐以求的，是象林彪那样“抢班夺权”！可不是吗？召开四届人大的时候，正因为毛主席不准他们“组阁”，所以他们没有“抢”到几个部长，因此对按照毛主席指示继续领导国务院的周总理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一九七六年初，毛主席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代总理，使“四人帮”大失所望，怨恨已极。“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书写着《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的黑文，喷出了要以他们的“新桃”换无产阶级“旧符”的毒汁。紧接着，他们又急不可待地拍摄了反动影片《反击》。他们是抓得多么紧，“抢”得是多么快呀！

“四人帮”疯狂地向着坟墓奔跑，不断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射炮弹。《反击》就是他们的“重磅炮弹”，声称要“在走资派那里”成为“强级地震”！他们幻想着：只要《反击》这颗反革命政变的信号弹一打响，他们制造的“强烈地震”一发生，他们那个“锁在烟雾中”一心想当女皇帝的江青就会“露峥嵘”，坐龙庭，我们的国家就要改变颜色，他们就要以法西斯专政代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四人帮”的先生们，你们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地球决不会停止转动，历史的巨轮，难道会因为你们这几只横行霸道的螃蟹、挡车的螳螂，就停步不前吗！

就在“四人帮”垮台的当天，他们的一个心腹，《反击》的直接炮制者，还恶狠狠地发出狂吠，说什么“恨不得

马上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他们所谓韩凌这“一层人”，实即中央到地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完全打倒，他们就可以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建立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不消说，他们理想中的这种“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永远也不会有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要整象他们这样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生前的教导，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今后我们还要进行多次，这是毫无疑义的。可惜“四人帮”先生们，连第二次都没有等到，就急不可待地跳出来，而且很快地滚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反击》这支反革命狂想曲也只能随之幻灭了！

“四人帮”利用《反击》掀起的所谓“江涛”，只不过是一股小小的逆流，现在，才真正到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发起坚决反击的时候了！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大反击，这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由华主席亲自指挥的，亿万军民对“四人帮”的一场大决战，这是真正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真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嚣张一时，不可一世的“四人帮”，看你们还往那里逃跑！正是：

四海波涛间天涌

千军横扫“四人帮”！

（原载一九七七年元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次“预演”

——评反动电影《反击》

朱兵 杨志杰 杜书瀛

“山雨欲来风满楼”王张江姚“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他们精心泡制的电影《反击》，就是一发进行反革命政变的“信号弹”，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现在，是彻底戳穿“四人帮”炮制《反击》的罪恶用心的时候了！

—

《反击》的出笼，是“四人帮”精心策划的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反革命事件，是他们整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我们首先看一看《反击》出笼的背景。

“四人帮”密谋策划搞《反击》的时间，正是一九七六年初，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达之后。就在一号文件发出的同一天，张春桥就狗胆包天地写下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丧心病狂地发泄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强烈不满，特别是对毛主席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咬牙切齿，极端仇恨。他引用的古诗“新桃换旧符”，是“四人帮”阴谋篡

党窃国的反革命纲领。电影《反击》，正是体现这个反革命纲领的黑标本。

一九七六年春，“四人帮”打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号，疯狂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居心叵测地制造了两个反革命口号：一、在政治上，叫做“层层揪代理人”。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由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这就是他们叫嚣“新桃换旧符”的实质。二、在文艺上，提出要抓“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这是“四人帮”想利用文艺这个阵地，为他们篡党窃国的狼子野心制造反革命舆论。《反击》正是他们这种反革命理论的实践产物。“四人帮”别有用心地用“倒栽赃”的办法，把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干部，统统描绘成“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推到应被打倒的行列中去；而把货真价实的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四人帮”一伙，却乔装打扮成“无产阶级革命派”、“正确路线的代表”。“四人帮”就是用这种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手段，妄图达到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目的。

炮制《反击》的过程，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变计划，是密切配合，紧相呼应的。

“四人帮”对《反击》极为重视。先由头面人物江青以请客吃饭为名召开黑会，纠集他们的重要骨干和得力爪牙密谋策划，作了精心安排。在编写剧本和电影拍摄的过程中，从影片定名，人物选择，情节安排，到人物的姓名年龄，服装道具，语言动作，甚至外景的选定等等，无一不是“四人帮”亲自拍板定夺。具体工作人员的意见，他们根本不听；革命群众的强烈反映，他们嗤之以鼻；各地党委的坚决反

对，他们置若罔闻。总之，一定要按照他们的反革命意图和方针办，稍不遂意，便大发雷霆，严加训斥。他们要把这部影片作为“重磅炸弹”，在他们的反革命政变计划中发挥作用。

按照“四人帮”的意图，“宁可粗点，但要快点”，“要配合当前的重大政治斗争”，“五一”拿出剧本，“十一”电影上映。“四人帮”的篡党野心，已经急不可待了！

《反击》终于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底，“四人帮”策划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前夕出笼了！但是，《反击》并没有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得手的纪录，而是作为解剖“四人帮”篡党夺权野心的罪证，与革命观众见面了！

二

《反击》的要害就是篡党夺权。只要我们认真解剖一下“四人帮”在《反击》中挖空心思塑造的主要人物和设置的矛盾冲突，便可一目了然。

首先看一看《反击》中的两个主要人物。

韩凌，这是“四人帮”一伙在《反击》中描写的一个老干部，一个所谓“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典型人物。按照《反击》的描绘，政治上，他不读马列，不懂马列，顽固推行一条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作风上，他骄横恣肆，独断专行，具有法西斯般的残忍和狠毒；生活上，住的是别墅庭院，时而室内浇花，时而池旁钓鱼。总之，韩凌蜕化变质，腐朽透顶，比过去地主、资本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观众不禁要问，这难道是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的形象吗？不！这是“四人帮”的栽赃陷害。韩凌的所作所为，正是“四人帮”实际生活的写照。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他们干着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篡党夺权的勾当；他们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结帮营私，排斥异己，唯我独尊，称王称霸，把他们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和党中央之上；他们沉缅于骑马，打猎，钓鱼，酗酒，听旧戏，看黄色电影，每个毛孔都散发着资产阶级的臭气。正因为“四人帮”自己对韩凌那一套思想、生活和作风有着极为深刻的亲身体会，所以他们才能描写得那样真切。韩凌的形象，正是“四人帮”丑恶灵魂的大暴露！

“四人帮”所以如此仇恨革命的老干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把老干部看作是他们的篡党窃国的重大障碍。革命老干部，胸怀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跟随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南征北战，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紧紧团结在毛主席、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道上奋勇前进。这些老干部，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焕发了青春，提高了觉悟。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这些，是“四人帮”一伙丑类所切齿嫉恨的。虽然，在老干部中，也有极少数退坡、落伍，但这决不能代表我们党的老干部的主流和本质。革命的老干部，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极其宝贵的财富，他们和革命的新干部团结一致，老中青三结合，取长补短，互勉互励，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要条件。“四人帮”要想篡党夺权，必然把这样一批老干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就是“四人帮”在《反击》中塑造韩凌形象的政治用心。

特别令人愤慨的是，“四人帮”一伙还通过对韩凌形象的塑造，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他们给韩凌安排了一个秘书，而这个秘书竟用了周总理的一位秘书的名字。当这个阴谋被揭穿时，他们仍然采用谐音的办法继续影射。“四人帮”攻击周总理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是可忍，孰不可忍？！

《反击》中的江涛，是“四人帮”极力要火树特树的“英雄形象”。这个家伙挂着共产党干部的招牌，穿着工人的服装，讲着马列主义的词句，实际上则是披着羊皮的豺狼，干着篡党夺权的勾当。我们必须拔掉他手中的红旗，撕下他身上的画皮，使其露出本相。

江涛身上有三件伪装。

第一件，“教育革命的旗手”。

《反击》中的江涛是黄河大学工宣队的负责人、党委书记兼省委常委，是搞教育起家的。实际上是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扼杀党的教育事业的刽子手。

在教育战线上，江涛以资产阶级政治和单搞生产代替教学，歪曲毛主席关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反对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对抗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指示，完全废止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学习，推行一条“零分加螃蟹”的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如果按江涛的一套搞下去，不仅教育、科学技术不能发展，而且长此以往，只能教唆出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充当打手的亡命徒。江涛是破坏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罪魁

祸首。

第二件，“正确路线的代表”。

《反击》中的江涛，自始至终以“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居。电影用倒叙的形式，追溯了江涛十三年“造反”的历史。最初，他喊着旧教育制度“吃人”，离开了黄河大学，继而以工宣队的身份进驻了黄河大学，后来成为黄河大学的党委书记，与韩凌“对着干”，大抓“现代的投降派”。江涛是一贯正确的革命路线的代表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篡改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抢过革命的口号，嫁祸于人，其实是当代宋江，是“戴着红帽子，藏着黑心肝”的魑魅魍魉。

第三件，“反潮流的英雄”。

对于错误的潮流，反动的潮流，当然要反，这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但是“四人帮”想把江涛打扮成“反潮流的英雄”，是别有用心。

江涛无视党的教育方针，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破坏党的教育事业，他反对的是革命的潮流；他培植亲信，结帮营私；他诬蔑党的领导，丑化党的干部，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肆意践踏党的纪律和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他狂妄地叫嚣，从中央到地方，有很大一部分权力掌握在走资派手里，公然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由此可见，江涛决不是什么“反潮流的英雄”，而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篡党窃国的江洋大盗！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围绕江、韩设置的矛盾冲突，看一看“四人帮”炮制《反击》的险恶用心。

江涛和韩凌的矛盾冲突有四个回合。

两场考试是第一个回合。一场考试是“考学生”，是韩凌搞的。影片描绘韩凌下令撤回开门办学点，提倡加强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的学习，先摸一摸底，检查一下教育质量，对学生进行了一次“临时测验”。另一场是“考教授”，这是江涛搞的。他认为韩凌的考试，是对学生搞“突然袭击”，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那一套，是复辟，于是江涛就来了个以“突然袭击”对“突然袭击”，使教授们当场出丑。

在这个回合中，电影把省委第一书记韩凌描写成复辟派，算帐派，扼杀教育革命的刽子手，而把江涛塑造成“教育革命的旗手”。电影通过这一对比，企图点出江、韩的斗争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电影为江涛涂脂抹粉，对韩凌丑化诬蔑，目的是给江涛夺韩凌的权做一个铺垫。

整顿与反整顿是第二个回合。影片描绘韩凌不仅在教育界，而且要在工业、农业、科技、文艺等各条战线上实行全面整顿。江涛和赵昕则反对整顿方针，诬蔑整顿是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韩凌在省报上宣传整顿方针，江涛则利用黄河大学学报叫嚣反对整顿方针。《反击》把省报写成是韩凌修正主义路线的喉舌，“白给”也没人要的报纸，而江涛一手操纵的学报则被描绘成宣传真理的阵地，人民群众排长蛇阵争着购买，围在一起认真学习，简直把学报捧到了经典著作之上。电影中描写韩凌对学报束手无策，只能采取行政手段，禁止销售，派人撕毁，并绑架卖报学生。从这个回合我们可以看出，江涛以黄河大学为基地，以黄河大学学报为宣传工具，开始和省委公开唱对台戏。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电影中江涛的伎俩和当年托

洛茨基、布哈林之流的手段，真是如出一辙。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诬蔑老布尔什维克“蜕化”，江涛则诬蔑老干部都是“走资派”；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创办“派别组织的机关刊物”与党中央的杂志对抗，江涛则抓住黄河大学学报同省报分庭抗礼，……他们的手段和反革命野心，竟如此不谋而合。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不正是江涛之流的老祖宗吗！

第三个回合是捉放江涛。影片描绘韩凌和江涛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韩凌宣布江涛“挂职下放”，江涛则认为这是“打击造反派”，压制不同意见，是“复辟、倒退行为”，并且继续主持黄河大学党委工作，写出大字报，说韩凌是“正在走的走资派”。于是韩凌采取措施，把江涛投入监狱。影片极力渲染韩凌的残忍、阴毒，又竭力描写江涛的临危不惧，威武不屈。最后，由于江涛及其后台赵昕的斗争，韩凌不得不释放江涛，恢复其原职。

通过这个回合，影片的炮制者借剧中人物田大娘之口，说明韩凌这样的老干部从民主派到走资派，是一个必然规律。他们重新上台，就是修正主义上台，资产阶级上台，法西斯上台，他们对待革命人民的手段比过去的“还乡团”还厉害。这是“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所制造的反革命理论。大家知道，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老干部，大都心怀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作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革命发展的规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他们很快地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决不是什么必然成为走资派。“四人帮”认为，对

韩凌这样的人，就是要打倒，篡夺省委的领导权，已成水到渠成之势。这就是他们通过第三个回合所要说明的问题。

第四个回合是“大坝事件”。在这个回合中，江涛在赵昕支持下夺取省委领导权，并把魔爪伸向全国伸向北京。看！当江涛被“群众”象欢呼“英雄”和“领袖”一样，从狱中迎接出来以后，他就坐镇省委办公大楼，主持省委工作。“文件”要由他“修改定稿”，才能下发；省委第一书记、秘书长要接受他的“训教”；他“代表”省委在大会上讲话。这一切说明，江涛已经篡夺了省委领导权。江涛如此胆大妄为，不可一世，就因为他有“后台”。他所谓的“中央”，决不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而是“四人帮”反党集团。君不见，电影中的那位赵昕，不正是“四人帮”头面人物江青的影子么！不仅思想、语气、动作，就连那副眼镜也是“江式”的！随后，影片中的“大坝事件”，把江、韩矛盾推向了顶峰。江涛伙同赵昕动用“第二武装”，镇压了“反革命暴乱”，把韩凌写成是“反革命”的后台，理应被打倒，被夺权，由江涛与赵昕出面左右形势，“掌握全局”。

但江涛和赵昕夺取省委领导权，仅是他们篡党夺权的第一个人步。在第三个回合中，影片已用江涛的口别有用心地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并通过江涛在狱中的“心声”说道：“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谁能把共产党员投进监牢呢？国民党办不到，地主、资产阶级办不到，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办到了。”赤裸裸地攻击我们党中央，攻击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诬蔑党，是为了篡党；他们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他们诋

毁社会主义，目的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江涛出狱之后，又对赵昕意味深长地说：“从中央到地方有很大一部分权力被韩凌这样的走资派掌握着。”这就是说，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都有应该打倒的走资派，层层都应该由江涛勾结赵昕之流去夺权。在这里，“四人帮”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不是已和盘托出了吗！

在“大闹事件”中《反击》还进一步把罪恶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华国锋主席。电影居心险恶地让一伙“反革命分子”组织“拯救四化委员会”，打着“保卫四化誓师大会”的黑色横幅，进行所谓“反革命暴乱”。谁都知道，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是毛主席提出的，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一极为重要的指示，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电影丧心病狂地攻击毛主席和周总理，真是狗胆包天。在剧本写作过程中，“四人帮”一伙还曾提出剧本中要与一个支持韩凌的中央领导人，更加暴露了他们明目张胆地反对周总理的狂妄野心。华国锋主席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四人帮”也把华主席看作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利用种种机会栽赃陷害，在《反击》中也进行了含沙射影的攻击。听！江涛“批判”韩凌时说：他们“抬出你这个大官来做他们的领袖，而你又自愿充当他们的保护伞，你又是什人！”这是在批判一个省委书记吗？显然不是，而是另有所指。这一点在“四人帮”策划第二部电影，即《反击》的续篇时，讲得就更为露骨，他们提出：要站在全国的高度，写更大的题材，写今天还在走的走资派，内容要写按既定方针办还是不按既

定方针办的斗争。这就更加明显地暴露了他们妄图推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狼子野心。事实上，“四人帮”也正是这样干的。他们以伪造毛主席的所谓“临终嘱咐”，唆使一些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表”，甚至准备反党报告，印制“标准像”，一直发展到阴谋策动反革命暴乱，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他们反党反人民反革命，达到了何等疯狂的程度！

在《反击》中描写的江涛及赵昕之流一步步夺权的经过，也正是“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蓝图。“四人帮”曾经自鸣得意地认为，《反击》一旦抛出，就会造成一场“强烈的地震”，“引起连锁反应”，好象无产阶级的江山就会毁于旦夕。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这些倒行逆施的小丑。

三

当《反击》这部黑影片刚刚拍完的时候，“四人帮”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已经到了箭上弦、刀出鞘的最后阶段。他们已经在恶狠狠地叫嚷要“镇压”，“杀人”，“枪毙”，准备血腥屠杀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他们很快就要下毒手了。

他们得意洋洋地宣称，《反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选择“适当时机”上映，作为打向无产阶级的一个“铁拳头”。去年十月四日，“四人帮”以“梁效”笔名发表了反党夺权的动员令——《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紧接

着，他们准备十月十日在全国同时上映《反击》，他们要向无产阶级进行反革命夺权了！

原来，所谓《反击》，就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全面出击，就是对无产阶级的猖狂反扑！

霹雳一声震天响，拨开乌云见太阳！正是在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严重关头，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罪恶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四人帮”垮台了，我们的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四人帮”一伙永远也看不到《反击》上映了！他们只能看到亿万人民对他们反党阴谋的彻底清算！《反击》连同他们的整个反革命夺权阴谋，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被全国八亿军民彻底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历史十分公正地、毫不客气地把耻辱、失败和灭亡送到他们手里。这再一次证明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六六年所作出的科学论断：“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四人帮”正是这样一小撮阴谋搞政变的“不得安宁的”、“短命的”、“反共的右派”。

今天，揭露“四人帮”炮制《反击》这个反动影片的阴谋，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革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都决然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原载一九七七年元月十三日《解放军报》）

反革命影片《反击》情节简介

影片《反击》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大毒草。其简单情节如下：

一九七五年夏，黄河大学党委书记、工宣队负责人江涛（片中以正面人物出现，实则是一个反党野心家的形象），带着学生在黄河大坝工地开门办学。省委第一书记韩凌（这是捏造的一个走资派形象，他刚刚恢复工作，住在一座华丽的别墅里，屋内有滴水泉、金鱼池）由北京回来，带回邓小平关于“教育要整顿”的精神。影片中捏造的另一个反面人物、黄河大学党委副书记乔柏仁，根据韩凌讲的精神，把开门办学点的师生揪了回来，并对同学进行了一次临时测验。工农兵学员大闯（为表现野心家江涛而设置的一个人物）反对说：“这是突然袭击。”江涛支持这个意见，并以召开教授会为名，对教授们进行了反考试。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赵昕（女，这也是被当作正面人物宣扬的一个野心家形象），来到学校，称赞江涛做得“不错”，江涛要明天就把师生重新送回开门办学点去。这些情节的设置，是为了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党的领导干部，美化野心家江涛、赵昕，为“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揪一层人”制造根据的。

省委领导的《黄河日报》发表了题为《教育必须整顿》的社论，《黄河大学学报》登了“工农兵学员”批评这篇社论的文章。根据韩凌的指示，估报亭停止发售学报。江涛到韩凌家提抗议，同韩凌进行了一场争执。这时赵昕也赶来，

支持江涛，批评韩凌。影片有意把“省委”的报纸说成是“修正主义”的，把校刊说成是“正确”的，它在发挥“指导”作用，让学校凌驾于省委之上。

韩凌在鱼池边钓鱼。他向乔柏仁等说，他同邓小平通了电话，决定把江涛“挂职下放”。他派宋秘书到学校宣布了这项决定。江涛贴出了《走资派还在走》的大字报（这与“四人帮”借批走资派为名，妄图打倒一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同志的反动思想一致），并赶到黄河边上阻拦把学生从办学点上接回学校。韩凌听到这些情况后，生气地说，他要给江涛“安排个合适的地方。”

接着，影片杜撰了这样的情节：深夜，一辆黑轿车驶向村口，抓走了江涛。田大娘在村头槐树下向社员和学员们讲述了二十八年土改工作队的韩凌被还乡团逮捕时，儿童团员江涛等，冒着生命危险，打死团丁，救了韩凌。然后，田大娘说：“没想到哇，当年被还乡团抓走的韩凌，今天他也成了还乡团。”同这些回忆镜头相呼应，江涛在牢房中也大骂“还乡团”。

后来赵昕等到监狱把江涛接了出来。他们要在庆祝大坝放水排沙成功的同时，召开全省各系统的所谓批邓大会。在大会召开时，影片中别有用心地安排了一个名为“拯救四化委员会”的一些人出来捣乱会场的情节。韩凌赶来支持这些人。江涛调动民兵，包围了“闹事的人”。这时赵昕乘着一辆披红挂绿的彩车赶来，以“代表正确路线”的省委主要负责人自诩，登上主席台，宣布了中央的两项重要决议。韩凌软瘫在椅上。影片以反党野心家赵昕和江涛夺了省委和黄河大学的权作为结束。